《東華漢學》第 8 期；107-140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08 年 12 月

余嘉錫以史評進路箋疏《世說新語》的現象考察

吳冠宏*

【摘要】

余嘉錫泛覽史傳群書，苦心經營以成《世說新語箋疏》，其治學不僅具有考證史料之客觀主義的本色，又深受強調義利之辨及砥礪名節之傳統宋學的影響，在感時憂國的悲憤下，尤投射出個人強烈的主觀色彩與時代關懷，然學界至今對余氏以史評進路箋疏《世說新語》仍一直未有專論出現。

有鑒於此，本文試圖從「風習澆薄、遺事違禮」、「賞譽不當、褒貶失實」及「不明出處、不見忠義」三個面向切入，將余氏零散、片斷、龐雜的箋疏文獻予以統攝、類分，基於同情之理解的立場，並透過多層次的考察與脈絡化的處理，使這三個面向得以在具體的文獻中充分展開，進而由此詮釋現象透顯出余氏褒善貶惡的道德情懷及其心繫家國興亡的民族意識，以作為爾後進一步反省余氏《世說新語箋疏》之詮釋得

* 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失的論述基礎。

關鍵詞：余嘉錫、史評、世說新語、魏晉士風

一、前言

余嘉錫（1884-1955）《世說新語箋疏》一書，流傳極為廣泛，影響亦可謂深遠，余氏學養人品俱佳，曾謂其「一生所著甚多，于此最為勞瘁」[1]，可見他對此書的重視與投入，周祖謨於《世說新語箋疏‧前言》即點明：

> 《箋疏》內容極為廣泛，但重點不在訓解文字，而主要注重考案史實。對《世說》原作和劉孝標《注》所說的人物事迹，一一尋檢史籍，考核異同；對原書不備的，略為增補，以廣異聞；對事乖情理的，則有所評論，以明是非。同時，對《晉書》也多有駁正。這種作法跟劉孝標《注》和裴松之《三國志注》的作法如出一轍。[2]

根據周祖謨的說法，余氏箋疏《世說新語》著重在「考案史實」，與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和裴松之《三國志注》相類，皆是本史家的立場而來。除此之外，周氏又進一步指出：

> 古人說「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研究前代歷史，自當明鑒戒，勵節概。作者注此書時，正當國家多難，剝久未復之際，既「有感於永嘉之事」，則於魏、晉風習之澆薄，賞譽之不當，不能不有所議論，用意在於砥礪士節，明辨是非，這又與史評相類。[3]

周祖謨認為余氏箋疏《世說新語》不僅在考辨史實而已，更有「砥礪士節，明辨是非」的用意，其實這種立基於時代關懷以知人論世的作法，當是通貫余氏著作的核心精神，故檢視其《四庫提要辨證》，於糾繆《四庫全書總目》中亦寄寓時代意義，感事而發，使目錄彰顯時代背景和歷

---

[1]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前言》（臺北：華正書局，1989），頁3。
[2]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前言》，頁3。
[3]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前言》，頁3-4。

史意義的評價。[4]北京淪陷期間，余嘉錫撰寫《世說新語箋疏》，開設《世說新語研究》課程，可見余氏雖承清代樸學以來尚實黜虛之風，強調名實相符，故史料考證必力求歷史之真，然余氏曾經有：「宋人史學勝清儒」之說，[5]其立身處世尤深受強調義利之辨及砥礪名節的宋學影響，[6]是以余氏治學不僅具有考證史料之客觀主義的本色，其訴諸個人議論時，又在感時憂國的悲憤下，流露出對魏晉士風與時尚的批判，由是對於魏晉人物與歷史事件，每投射出他個人的識見與論斷，烙印著強烈主觀的風格與色彩，自非一般傳統史評可以全然涵括。

余氏泛覽史傳群書，苦心經營以成《世說新語箋疏》，從其流傳與影響之廣遠而言，的確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然學界至今對此仍未有專論出現，究其原委，或肇因於文獻過於零散、片斷又相當龐雜使然，因此如何對余氏以史評進路箋疏《世說新語》的詮釋現象進行有效地類分與統攝，遂成為開展余氏世說學的重要關鍵。《後漢書》卷四十三〈朱穆傳〉有云：「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7]，東漢末朱穆即以〈崇厚論〉來力矯時弊，余嘉錫於〈德行〉第十三則「論王朗與華歆

---

[4] 周祖謨，〈余嘉錫先生傳略〉曾提及：「故《辨證》中多考證而少議論，凡於事實有疑誤處，則博引群書，詳加訂正。至于書中要旨，則提要鉤玄，引而不發，由讀者自去領悟。所謂議論處，多為陳述學術源流，評騭人品之美惡和士風之高下，以端正學者的趨向。《提要》經紀昀一手刪定，崇漢學而貶宋學，似乎宋學一無可取。實際上，宋儒重士習，厚德行，有關家國之興亡，不為不重要，書中於此三致意焉，用意極為深刻。」見余嘉錫《余嘉錫文史論集》（長沙：岳麓書社，1997），頁672。

[5] 見周祖謨，〈余嘉錫先生傳略〉，《余嘉錫文史論集》，頁668。

[6] 周祖謨云：「至於立身處世則深受宋代儒學的影響。他秉性剛直，尤嚴義利之辨。注重知人論世，砥礪名節」（頁679）、「對魏晉士大夫佯狂避世以自保，高唱無為以求安的矛盾心理狀態均作了深刻的剖析」（頁675）、「又說：『凡事當明辨是非，不可從風而靡，不可見利而忘義。當有所為，有所不為。』他立言謹行，殷殷期望於後學如此，都來自於宋學」（頁681），見〈余嘉錫先生傳略〉，《余嘉錫文史論集》。

[7] 《後漢書・卷四十三・朱穆傳》（臺北：洪氏出版社，1978），頁1463。

之優劣」時亦語重心長地說：

> 自後漢之末，以至六朝，士人往往飾容止、盛言談，小廉曲謹，以邀聲譽。逮至聞望既高，四方宗仰，雖賣國求榮，猶翕然以名德推之。華歆、王朗、陳群之徒，其作俑者也。觀吳志孫策傳注引獻帝春秋，朗對孫策詰問，自稱降虜，稽顙乞命。蜀志許靖傳注引魏略，朗與靖書，自喜目睹聖主受終，如處唐虞之世。其頑鈍無恥，亦已甚矣。特作惡不如歆之甚耳，此其優劣，無足深論也。[8]

筆者認為此一段案語可以彰顯余氏史評眼目，如探本溯源以見風氣之變始於東漢末，一直是余氏面對魏晉之歷史文化現象的論述進路，[9]跳脫流俗之聲譽，指出其賞譽不實的現象，進而以「始作俑者」，掘發積弊之禍源，遂依據相關史料揭露華歆、王朗、陳群於易代之際的可恥言行，而有「頑鈍無恥，亦已甚矣」的價值評斷，可謂痛切之至！最後再結之以「無足深論」來否定《世說》的優劣高下之談。若依此釋例之線索，余氏對後漢之末以至六朝士人的批評，大體上乃著眼於「風習澆薄」、「賞譽不當」、「不明出處」三個面向，[10]若配合其他箋疏的文獻以觀，有必要再各自附上「遺事違禮」、「褒貶失實」、「不見忠義」三個輔

---

[8]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13・箋疏3》，頁15。

[9] 如余氏箋疏〈德行〉第十七則云：「蓋魏、晉人一切風氣，無不自後漢開之」（頁21）、〈容止〉第二則云：「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蓋漢末貴公子習氣如此，不足怪也」（頁608）、〈傷逝〉第一則云：「此可見一代風氣，有開必先。雖一驢鳴之微，而魏、晉名士之嗜好，亦襲自後漢也。況名教禮法，大於此者乎？」（頁636）、〈任誕〉第二十五則云：「伯仁名德，似不宜有此。然魏、晉之間，蔑棄禮法，放蕩無檢，似此者多矣。御覽八百四十五引典論曰：『孝靈末，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輒去衣露形，為戲樂也。』可見此風起於漢末」（頁742）。

[10] 前引周祖謨《世說新語箋疏・前言》已指出「魏、晉風習之澆薄，賞譽之不當」兩種線索，筆者認為有必要另標「不明出處」之綱目，才能有效地統整余氏箋疏《世說新語》的詮釋現象。

助名目來強化此三個面向的內涵，以作為本文的論述媒介與探索進路。

二、現象之一：風習澆薄、遺事違禮

在風雨如晦、家國有難之際，余氏展讀《世說新語》，不免對魏晉「蔑棄禮法、放蕩無檢」的脫序言行及「尚虛浮、反務實」的治事作風，訴諸一種批判的聲音及檢討的口吻，並透過歷代史評的合鳴共振，召喚出一種千古之殷鑒。通篇以觀，余氏對於魏晉風習之澆薄的批判，當以箋疏〈賢媛〉及〈任誕〉兩篇之首則的案語最具代表性，〈賢媛〉首章案語有云：

> 本篇凡三十二條，其前十條皆兩漢、三國事。有晉一代，唯陶母能教子，為有母儀，餘多以才智著，於婦德鮮可稱者。題為賢媛，殊覺不稱其名。唐修晉書，列女傳纔三十四人，而五人出於外族。其晉人行義足尚者，不過十餘人耳。考之傳記，晉之婦教，最為衰敝。夫君子之道，造端夫婦。故關雎以為風始，未有家不齊而國能治者。婦職不修，風俗陵夷，晉之為外族所侵擾，其端未必不由於此也。故具列當時有識之言，以為世戒。干寶晉紀總論曰……抱朴子外篇疾謬篇曰……[11]

余氏認為〈賢媛〉所列，就晉而言，除陶母之外，[12]大體皆為才智之人而非婦德之流，故有不稱其名之感。依「君子之道，造端夫婦」及「關雎以為風始」之古訓，是言男女好逑，自然有道，由情動為始，禮樂節之，是以夫婦同心成家，家興則國治，國治則天下平，著眼的不僅止於

---

[11]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箋疏1》，頁664。

[12] 實則我們觀《世說・賢媛》第十九則陶母所為，其所重亦不在傳統婦之四教，而是她的膽識謀略，能遺小見大，以成就其子的功業，可見仍是魏晉時人對才識的評賞。

個人，而是整體的社會網絡，故牽一髮即動全身，因此當婦職持家的根本不再受重視，嬉戲享樂成為主流意識，那麼造成的混亂可想而知。余氏進一步援引有識之士如干寶之《晉紀》及葛洪之《抱朴子》的相關記載，[13]讓我們見識到晉女不受禮教束縛而展現自由奔放的一面，這些縱情生活、敢愛敢恨的名媛，和名士般有著標竿的作用，帶領出一種無事自適的潮流，造就魏晉婦女獨特的風姿，然何以在干寶、葛洪、余嘉錫的筆下，卻有如一幅社會荒唐亂象的拼圖，而使他們對此大加撻伐？那是因為他們皆從婦德之不彰，推知魏晉士風之不振，後遂淪為外族所侵擾之命運著眼，是以婦德之不振正是亡國的徵兆，這種全然訴諸傳統婦德的判準，顯然與才智為尚的魏晉品鑒風潮有別，而無法真正觀照到〈賢媛〉的時代意義[14]，在當今這種性別書寫的重新檢視下，尤充滿著立足於男性立場的性別偏見，然余氏強調「婦教」作為家庭與社會安定的重要表徵，仍是舊時代不容忽視的文化寫照與關懷視角。

若〈賢媛〉一篇展現晉人女性的時代問題，〈任誕〉一篇亦透露出晉人男性的社會危機，余氏於首章案語有云：

> 國於天地，必有興立。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自古未有無禮義，去廉恥，而能保國長世者。自曹操求不仁不孝之人，而節義衰；自司馬昭保持阮籍，而禮法廢。波靡不返，舉國成風，紀綱名教，蕩焉無存。以馴致五胡之亂，不惟亡國，且幾亡種族矣。君子見微而知著，讀世說任誕之篇，亦千古之殷鑒也。文選四十九干寶晉紀總論曰……李善注引王隱晉書曰……抱朴子外

[13] 詳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箋疏1》，余氏援引干寶晉紀總論語及抱朴子外篇疾謬篇語。頁664。

[14] 梅家玲，〈依違於婦德與才性之間：《世說新語》〈賢媛篇〉的女性風貌〉一文即檢討余氏以傳統觀念抨擊〈賢媛〉造成有欠公允的論述限制，主張必須配合當代的品鑒風潮整體以觀。見氏著，《古典文學與性別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97），頁130-131。

篇刺驕篇曰……

全晉文三十五應詹上疏陳便宜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望；尋文謹案，目以蘭薰之器。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15]

余氏引《管子》語作為四維之德乃家國之本的張目，並視曹操求才、司馬昭保阮籍為禮法廢、名教蕩的關鍵原因，後亦援引干寶《晉紀》、王隱《晉書》、葛洪《抱朴子・外篇》，以揭露此歷史亂象的種種面貌，[16]使整個〈任誕篇〉不惟是名士亡國的文化徵兆，更成為有識之君子引以為戒的歷史見證書。此段案語最末援引《全晉文》應詹語，以見任誕為宗的社會風氣下，更瀰漫著一種「雅：望白署空／俗：尋文謹案」的價值分判，從而助長了名士遺事自高的作風，余氏對此現象也是深自警惕的，[17]因為正是這種尚虛背實的心態與風氣，才造成國勢不振、頹勢難挽的下場。

綜觀余氏案語的兩段文字，對於晉人女男兩性在此風習澆薄的世情下，任情恣性，違禮敗俗，有如一衰亡將臨的末世圖像，所謂「婦職不修，風俗陵夷，晉之為外族所侵擾，其端未必不由於此也」、「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都將五胡之亂、永嘉之禍推源於婦德之不顯與名士行事之萎靡，基於家國民族之安危興亡的考量，余氏尋繹出救弊之因以整頓道德、重振人心，並避免後人重蹈歷史之悲劇，可謂用心良苦。

---

[15]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任誕・箋疏》，頁726。

[16] 詳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任誕・箋疏》，余氏引文選四十九干寶晉紀總論語、李善注引王隱晉書語及抱朴子外篇刺驕篇語，頁726。

[17] 余氏有云：「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劉謙晉紀應詹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臺衡之量。尋文謹案，目以蘭薰之器。』導阿衡三世，而但封籙畫諾，真所謂『望白署空』《世說新語箋疏・政事・15・箋疏1》，頁178。王導憒憒之治，劉注引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可見在此當是認同王導簡易之作為，余氏卻據此「封籙畫諾」來證成所謂「望白署空」，坐實晉人政事之弊。

除了〈賢媛〉、〈任誕〉開篇以直搗黃龍的方式切入之外，余氏亦每透過相關人物的論述，對於魏晉士風的問題，產生出旁敲側擊的理解效用，在此試舉方正人物——「周伯仁」與「王坦之」兩則資料，以作為他間接闡述魏晉「蔑棄禮法、放蕩無檢」之脫序言行及「尚虛浮、反務實」之治事作風的釋例。

周伯仁能仗義直言，剛正不阿，是余氏相當欣賞的名士，但〈任誕〉第二十五則及劉注載其「穢雜無檢節」、「顗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面對這種與自我的人物評價相形衝突的文獻，余氏如何有效地予以對應，頗值得再三玩味：

> 嘉錫案：伯仁名德，似不宜有此。然魏、晉之間，蔑棄禮法，放蕩無檢，似此者多矣。御覽八百四十五引典論曰：「孝靈末，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輒去衣露形，為戲樂也。」可見此風起於漢末。本書德行篇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注引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伯仁與瞻等同時，不免名士習氣，故其舉動相同。特因其死在瞻等之後，晚年名德日重，故不與諸人同科耳。或謂諸人雖裸袒，不過朋友作達，何至眾中欲通人妾？不知王隱謂瞻等露醜惡，同禽獸，則亦何所不至？且此自是當時風氣。亦不獨瞻等為然也。抱朴子疾謬篇曰……沈約宋書五行志一亦曰……二書之言，雖詳略不同，而曲折相合，知當時之風氣如此。伯仁大節無虧而言戲穢雜，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以彼任率之性，又好飲狂藥，昏醉之後，亦復何所不至？固不可以一眚掩其大德，亦不必曲為之辯，以為必無

此事也。[18]

余氏開先便以「伯仁名德，似不宜有此」起筆，然進一步從歷史的脈絡以觀，認為此風起自漢末，伯仁又與八達者同時，是以若從當時諸多歷史的文獻來多加對照，如《抱朴子・疾謬篇》與《宋書・五行志》即可以發現此流俗習尚之盛況，[19]故遂有「大節無虧而言戲穢雜，蓋習俗移人，賢人不免」的評斷，由是指出「以一眚掩其大德」與「曲為之辯，以為必無此事」都沒有必要，依此不僅可以重新回到尊重歷史真實的態度，又能化解對周伯仁之人格評價的矛盾，特別是援引沈約《宋書・五行志》的線索，所謂「蓋胡翟侵中國之萌也」，掌握到文化沉淪乃家國喪亡之徵兆，連一代名德如周伯仁者都無法免此習氣，魏晉士風之萎靡可想。余氏對周伯仁正義之認同與任誕之批判，在這兩種對反之力道的遇合下，無形中反成為余氏彰顯魏晉風習澆薄的利器。

王坦之以名言正論，深得余氏持論之正的欣賞[20]，然《世說》所謂「方正」之事，即使關涉的是王坦之的言行作為，余氏也未必照單全收，而且反而能見微知著，並透過王坦之務實的一貫作為來反襯當時無法抵擋之尚虛浮的時代風潮：

> 嘉錫案：後漢尚書郎，多以孝廉或博士高第為之。名公鉅卿，往往出於其閒。至西晉山濤啟事，尚稱尚書郎極清望，號稱大臣之副（見書鈔六十引），其為要職可知。而過江以後，膏粱子弟遂薄之不為。以致坦之拒之於前，國寶辭之於後。其故何也？蓋自中朝名士王衍之徒，祖尚浮虛，不以物務自嬰，轉相放效，習成

[18]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任誕・25・箋疏1》，頁742-743。

[19] 詳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任誕・25・箋疏1》，余氏引抱朴子疾謬篇語及沈約宋書五行志語。

[20] 余氏有云：「謝安晚歲，雖期功之慘，不廢妓樂。蓋藉以寄興消愁。王坦之苦相諫阻，而安不從。至謂『安北出戶，不復使人思』，正憤其不能相諒耳。惟右軍深解其意，故其言莫逆於心。案右軍嘗諫安浮文妨要……然持論之正，終不及坦之。」見《世說新語箋疏・言語・62・箋疏3》，頁122。

> 風尚。以遺事為高，以任職為俗，江左偏安，此弊未改。尚書諸曹郎，主文書起草（見漢、晉志），無吏部之權勢，而有刀筆之煩，固名士之所不屑。惟出身寒素者為能黽勉奉公，不以簿書期會為恥，選曹亦樂得而用焉。相沿日久，積重難返。坦之嘗著廢莊之論，非不欲了公事者，然以世族例不為此官，亦拂然拒之矣。士大夫之風氣如此，而欲望其鞠躬盡瘁，知無不為，何可得也！[21]

《世說新語》視王坦之言「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為方正不阿的表現，余氏跳脫此世俗之見，重新檢視後漢至魏晉之尚書郎官職之重要性的演變，依此一窺世族士人心態的轉化，名士不為尚書郎正是「以遺事為高，以任職為俗」之風使然，可以說已成為士階級的集體意識，是他們尋求社群認同的一種方式，故即使如著〈廢莊論〉之王坦之，非不欲任事者也只能在此風潮下拂然拒之，尚書郎官竟淪為寒素之品所專，余氏語多慨歎，由是王坦之「何得擬我？」的質問，遂不僅是一矜尚門第之名士者的堅持而已，無形中亦流露出魏晉積弊難返的士風，使余氏有尋覓鞠躬盡瘁者終不可得的遺憾。

透過「周伯仁」、「王坦之」兩例的揭示，我們可以發現單一人物置於歷史之眾流中何等渺小，積漸之深後便習以為常，因此回眸歷史的發展痕跡，造成往而不返之始作俑者，尤難逃余氏春秋之筆的批判，故余氏對開清談風氣之先的何晏、王弼[22]及任誕風氣之先的阮籍，[23]即使李

---

[21]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方正・46・箋疏3》，頁324。

[22] 李慈銘云：「案范武子以清談禍始，歸罪王、何，謂其浮於桀、紂。予謂漢末之五荀、五陳，實任達之濫觴，浮華之作俑。觀其父子兄弟，自相標榜，坐致虛聲，託名高節。太丘弔張讓之母，朱子謂其風節始頹。其後群附曹氏，泰黨司馬。荀氏則爽為卓用，彧成操篡，勗以還名節掃地。桀、紂之禍，自有所歸。輔嗣名通，平叔正直，所不受也。」嘉錫案：謂荀、陳虛聲誠是。欲為王、何減清談之罪，則非事實。」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品藻・6・箋疏1》，頁507；「乃知自王、何清談，嵇、阮作達，終晉之世，成為風氣。雖名父不能化其子。而其習俗，往而不返。晉之所以為晉，亦可知矣。」余

慈銘試圖為他們減罪或翻案，余氏仍有所不取，而堅持他們必須承擔一歷史的責難，雖然「清談誤國」的評斷歷來多所爭議，[24]且歷史發展的演變乃多重因素使然，絕非如此簡化之歷史觀可以全然論斷，不過余氏以家國興亡為關懷，認為引領先鋒的思想家對世俗人情具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此一知識分子的自覺使命，希望能透過文化的力量、社會倫常的教化來移風易俗以拯救時弊及國運的古道熱腸，又豈容我們全然抹煞。

相較於名士賢達的風習澆薄、遺事違禮，余氏注意到〈德行〉第四十五載陳遺「純孝之報」的意義，發而為虛浮末代的警世之言：

> 今案：……考世說所載多魏、晉之事，其下逮宋朝者，不過王謐、傅亮、謝靈運數人而已。皆名士之冠絕當時者。遺南土寒人，仕纔州郡，獨蒙紀錄，褒然為一代稱首。蓋因其純孝足貫神明，不以微賤而遺之也。自中原雲擾，五馬南浮，雖王綱解紐，風教陵夷，而孝弟之行，獨為朝野所重。自晉至梁，撰孝子傳者，隋志八家，九十八卷；兩唐志又益二家，三十四卷。其他傳記所載，

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品藻・80・箋疏1》，頁543。

23 李慈銘云：「案父母之喪，苟非禽獸，無不變動失據。阮籍雖曰放誕，然有至慎之稱。文藻斐然，性當不遠。且仲容喪服追婢，遂為清議所貶，沈淪不調。阮簡居喪偶黍臞，亦至廢頓，幾三十年。嗣宗晦　尚通，或者居喪不能守禮，何至聞母死而留棋決賭，臨葬母而飲酒烹豚？天地不容，古所未有。此皆元康之後，八達之徒，沈溺下流，妄誕先達，造為悖行，崇飾惡言，以籍風流之宗，遂加荒唐之論。爭為梟獍，坐致羯胡率獸食人，掃地都盡。鄧粲所紀，世說所販，深為害理，貽誤後人。有志名教者，亟當辭而闢之也。」嘉錫案：「以空言翻案，吾所不取。籍之不顧名教如此，而不為清議所廢棄者，賴司馬昭保持之也。觀何曾事自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任誕・9・箋疏2》，頁732。

24 清談誤國之說在當時也引起許多人的爭論，如桓溫與王羲之等人認為王衍等清談家要為西晉之亡國負起責任，但袁宏與謝太傅等人則認為時代之興衰更替，有其運勢，並非幾個清談家之口談虛浮就能造成亡國之實。後世有很多人也為此進行過爭論，如顧炎武、王夫之、章太炎等人。

猶複累牘連篇。倫常賴以維繫，道德由之不亡。故雖江左偏安，五朝遞嬗，猶能支拄二百七十餘年，不為胡羯所吞噬。至於京、洛淪陷，北俗腥羶，而索虜鮮卑，亦復用夏變夷。終乃鴃舌革音，歸我至化。而其國亦入版圖。胡漢種族不同，而孝乃為人之本。然則處晦盲否塞之秋，而欲撥亂世反之正者，其可不加之意也哉。[25]

余氏案語所重不在陳遺的孝行本身，[26]亦有別於後人釋之以佛教因果報應說的角度，[27]卻認為南土寒士陳遺獨蒙紀錄，乃純孝足貫神明而為當世所稱，故得以與晉宋之際名士並列，不以微賤而遺之，遂由此點出亂世之中，王綱解紐，唯孝乃人為之本，是撥亂反正的力量所在，所謂「胡漢種族不同」、「晦盲否塞之秋」，可見余氏處日據國難之際，「有感於永嘉之事」，因此對此則別有用心，藉由兩晉南朝門第森嚴的時代氛圍下，南土寒士陳遺竟為一代稱首，對顯出作為文化之本——「孝」的恆常價值，由此召喚世人於亂世之際仍當秉持漢文化的永續以圖種族之不亡。

余氏對於魏晉士風的關注不僅展現在其史評的脈絡裡，也成為他訓詁與辨正《世說新語》文意的重要線索，如〈賞譽〉第六十五則「桓彝評徐寧海岱清士」：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

[25]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45・箋疏5》，頁50–51。

[26]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鎔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第四十五則，頁49。

[27] 傅錫壬指出此則與同篇47則，皆是受佛教因果報應說之影響下的產物，有別於論語所言之孝道，見氏著，〈世說四科對論語四科的因襲與嬗變〉，《淡江學報》第12期（1974.3），頁114。

> 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己不必無，真海岱清士。」[28]

李慈銘認為此則與《世說・賞譽》第八十四則：「王長史道江道群：『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己必無。』」類同，因此若作「不必無」，則庸下人矣，安得謂之清士？故主張「己不必無」當作「己必無」。劉盼遂亦有類似看法，兩者皆引他例以糾《世說》之衍誤，[29]而余氏卻能從兩例以轉進人格之別與士風之狀，從而證成《世說》之本文無誤，觀余氏案語有云：

> 盼遂所言雖似有據，然余以為徐寧、江灌之為人原不必相同，則桓彝、王濛之品題，亦故當有異。夫所謂人所應無者，謂衡之禮法不當有者也。而晉之名士固不為禮法所拘，禮所應無而竟有之者多矣。如王平子、謝幼輿之徒所為皆是也。時流競相慕效，卞望之欲奏治之，而王導、庾亮不從。徐寧行事不知何如？然見用於庾亮，疑亦不羈之流，故桓彝評之如此。若江灌者，本傳稱其以執正積忤謝奕、桓溫，視權貴蔑如，則實方正之士。故王濛反用桓彝之語，以為之目。其所取者既不一致，斯其所言，自不盡同矣。[30]

余氏從品鑒者與被品鑒者之線索，推論徐寧乃不羈之流、江灌為方正之士，而判讀此桓彝評徐寧、王濛評江灌兩句當有所別，故不可援此以證彼，由是得以跳脫舊解之拘滯，不必更改原文，而還此則以本來之面目。依此可知，余氏訓解文字，不惟尋檢相關史籍以考核異同而已，尤能透過魏晉的文化背景及人物類型，如「不羈之流——徐寧」與「方正之士——江灌」，作為其訓解文句的理據，進而對桓彝評徐寧諸語，在不增減改異文字的狀況下，尋繹出合理可從的解釋（余氏依「徐寧見用於庾

---

[28]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賞譽》第六十五則，頁459。
[29]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賞譽・65・箋疏2、3》，頁459-460。
[30]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賞譽・65・箋疏3》，頁460。

亮」之線索推論徐寧為「不羈之流」的理由並不充分，然下一「疑」字，即能使「十分可能」的合理推想取代了「必然如此」的斷然險論），此一說法適可與《晉書・桓彝傳》相互呼應，並避開李、劉二氏尋求於異動文句的模式，可見余氏能不為考據校讎所拘，進而從整體的時代風潮與人物特質的辨異，作為其判讀文意的重要支援，尤其是當時賞譽之世風，類徐寧之名士者尤多，余氏自是深知此風尚，亦深體其流弊，故得以使「已不必無」的徐寧，回應於魏晉時代不羈名士的身影，而走出舊解的泥沼。

綜而言之，我們從余氏〈賢媛〉、〈任誕〉兩篇之首案揭開其文化診斷書，呈顯的不僅是晉女晉男風習澆薄之末流的歷史圖像，更是余氏整體宏觀魏晉文化的史評視域；至於攸關「違禮：周伯仁」與「遺事：王坦之」之兩例，這看似個案的殊例，卻是魏晉違禮與遺事之流風難挽的力證，而余氏不惟從共時性的角度來彰顯以小觀大、以反襯正的論述效應，更經由歷時性的視角對魏晉思想與行為先鋒型的人物——如何晏、王弼、阮籍等進行一種探源式的批判；在眾多風習澆薄的名士之風下，余氏特從南土寒士「陳遺」的純孝之報，表彰民族文化存亡的最後一道防線——「孝」——的重要性，透過寒士與世族的對顯，將傳統倫理道德的信念注入撰述者的視域之中，充分顯現他主導文化價值的作風；至於「徐寧」一例得以走出舊解的框限，即在余氏對魏晉士風有一深刻的透視，故能依「方正——任誕」這兩種人物類型的分判作為其解決典籍歷來疑義的理據，由是我們針對余氏對於魏晉風習澆薄、遺事違禮的探索，便能從內容層次上的考察，轉化成他箋疏《世說新語》的一種視角。

三、現象之二：賞譽不當、褒貶失實

魏晉名士的品人風尚，向來傳為美談，而《世說新語》正是魏晉人

物風貌的品鑒實錄，劉辰翁有云：「《世說》之作，正在識鑒、品藻兩種耳，『余』（餘）備門類，不得不有，亦不盡然」，[31]饒宗頤亦云：「世說新語者，蓋人倫之淵鑒，而言談之林藪也」，[32]可見人物品鑒的課題，不惟在〈識鑒〉、〈賞譽〉、〈品藻〉三篇之中而已，其實是通貫全書各篇的關懷基調；然余氏在人物品鑒的核心篇目——〈賞譽〉首章案語卻云：

> 此篇所載，雖未必皆然，然觀其賞譽人者，如鍾會、王戎、王衍、王敦、王澄、司馬越、桓溫、郗超、王恭、司馬道子、殷仲堪之徒，並典午之罪人。被賞譽者，若樂廣、郭象、劉輿、祖約、楊朗、王應之類，亦金行之亂賊。則其高下是非，又惡可盡信哉！[33]

余氏以「典午之罪人」、「金行之亂賊」評價〈賞譽〉中諸多「賞譽者」與「被賞譽者」，即是以魏晉之罪人與亂賊稱之，用語何其嚴厲，是以「惡可盡信」遂成為他對治全篇溢美揄揚之詞的提醒。觀〈賞譽〉第三則言及謝甄對許氏兄弟（許虔、許劭）有「平輿之淵，有二龍焉」的賞譽，見許劭弱冠之時，更譽為：「有榦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匹；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可謂歎賞有加，余氏卻引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劭所謂月旦評者，特出於汝南一時之俗，傭耳僦目，借劭以自重。未數十年，而四方之士已起而議之者，吾以知劭之無真賞也」的說法而謂「杭氏之論當矣」，並從相關史料探知許氏兄弟私情之不協，遂發以下評論：

> 兄弟之間尚如此，其於他人之褒貶，豈能盡得其平乎？抱朴子自敘篇曰：「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

[31] 朱鑄禹，《世說新語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2），頁428。
[32]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饒序》（臺北：正文書局，2000），頁1。
[33] 此箋疏目前的位置安排，可能有誤，宜移至〈賞譽〉全篇篇首，如〈任誕〉與〈賢媛〉首篇之箋疏，頁415。

> 帝亦深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就諸葛恪、葛洪之言觀之，則許劭所謂汝南月旦評者，不免臧否任意，以快其恩怨之私，正漢末之弊俗。雖或頗能獎拔人材，不過藉以植黨樹勢，不足道也。[34]

余氏以許劭月旦評的例子，讓我們了解到臧否任意的現況，何公論之有？可見這種鑒裁不當、褒貶失實的現象，乃漢末以來的弊俗流風，看似獎拔人材，其實亦不過是植黨樹勢，別有居心，依此立場，余氏對漢末魏晉以來的賞譽之風，不免心存保留與質疑的態度，豈能盡信？尤其在其忠君愛國之觀念的貫徹下，賞譽所謂「叛賊之流」，更有重新檢討的必要，因此面對叛賊嗤鄙之流的祖約及弒君之賊、亡國之餘的張天賜，竟蒙受時流稱美，余氏感歎未解之餘，亦透過品鑒者與被品鑒者家族的關係線索，推究這重疊交錯的賞譽迷紗背後，實有著複雜的人情關涉，以證成「此正晉人互相標榜之習」、「好事之徒喜假借外人以邀聲譽」使然，[35]在此脈絡下，人倫風雅之美事，遂皆成華而不實、俗而不真之言論，觀余氏論〈雅量〉第十五則「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有云：

> 好財之為鄙俗，三尺童子知之。即好屐亦屬嗜好之偏，何足令人介意，本可置之不談。而晉人以此品量人物，甚至不能判其得失，無識甚矣。王若虛《滹南遺老集》二十八曰：「晉史載祖約好財

[34]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賞譽・3・箋疏3》，頁417-418。

[35] 余氏對祖士少的評斷有：「祖約叛賊，觀敬胤注所引王隱晉書敘其平生，至可嗤鄙。而王導與之夜談，至於忘疲。逸少高識之士，亦稱美之如此，所未解也」，至於余氏援引其他文獻對祖士少的討論，詳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賞譽・88・箋疏1》，頁471。余氏對張天賜的評斷有：「其實天賜弒君之賊，亡國之餘，末年形神昏喪，甘為司馬元顯弄臣，庸劣若斯，亦何足道？從來好事之徒喜假借外人以邀聲譽，梯航偶通，輒以為一佛出世。考其始末，大都不過如此」，至於余氏援引其他文獻對張天賜的討論，詳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賞譽・152・箋疏3》，頁496。

事，其為人猥鄙可知。阮孚蠟屐之嘆，雖若差勝，然何所見之晚耶？是區區者而未能忘懷，不知二子所以得天下重名者。果何事也？」又曰：「晉士以虛談相高，自名而誇世者不可勝數。『將無同』三語有何難道？或者乃因而辟之。一生幾量屐，婦人所知，而遂以決祖、阮之勝負，其風至此，天下蒼生，安得不誤哉？」《梁溪漫志》五云：「晉史書事，鄙陋可笑。如論阮孚好屐，祖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夫蠟屐固非雅事，然特嗜好之僻爾，豈可與貪財下俚者同日語哉？而作史者必待客見其料財物傾身障篦意未能平，方以分勝負，此乃市井屠沽之所不若，何足以汙史筆，尚足論勝負哉！許敬宗之徒，汙下無識，東坡以為人奴，不為過也。」[36]

余氏箋語後即引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及費袞《梁溪漫志》對魏晉賞譽不當的嚴厲批判，所謂「其風至此，天下蒼生，安得不誤哉？」便是從這些無識又無謂的勝負之判所引發的反省意識，可見余氏之見乃脫胎感同於此，皆視此品量人物為無稽之談。實則祖、阮之勝負，無關財、屐之高下，當在阮歎「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後的神色閑暢，此正是名士鍾情而能忘情的風采與神韻，而當時所賞，即在阮孚性情之美的真率與癡深。[37]惟在王氏、費氏、余氏的眼中，虛談終究無法顧實，是以若流連周旋於此，勢必誤天下蒼生。余氏選取歷代史評文獻來評斷魏晉人物與事件，一直是他箋疏《世說》的重要門路，劉知幾所謂「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38]其中「識」尤為關鍵核心，而在此所謂「無識甚矣！」的論述基調，正是他批判史家選材眼光、檢驗評價

[36]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雅量・15・箋疏1》，頁357。

[37] 可參拙作《魏晉玄論與士風新探——以「情」為綰合及詮釋進路》（臺北：臺灣大學中文所博論，1997），頁126。

[38] 宋・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修史官〉條。

適切與否的常見論斷，[39]只是在此所謂的「識」與「無識」，乃依歸於儒家的史學傳統與道德規範，實與魏晉的文化精神不相經緯。

在余氏所揭示之各種名實不符的賞譽現象中，又以東晉名士殷浩的例子最具諷刺性，因為殷浩可謂集當時之賞譽與眾望之所歸，最後卻兵敗如山倒，正是魏晉名士賞譽不當的典型具現：

> 嘉錫案：世說但稱朝野云云，不言何人，而晉書謂「王濛、謝尚以卜江左興亡」。識鑒篇云：「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晉書之言，即本於此。浩傳又載簡文答浩書曰：「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則簡文之意，與王、謝等。以殷浩擬管、葛者，必是此輩。蓋簡文以親賢輔政，王、謝為風流宗主，此數人之言，即朝野之論所從出也。簡文畏桓溫之跋扈，仗浩以為之抗。溫雖甚忿，而弗之憚，聲言北伐，行達武昌（見溫傳），朝廷大懼，浩遂欲去位以避溫（見通鑑九十九）。王彪之謂「當靜以待之，令相王為手書，示以欵誠」。浩曰：「處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見彪之傳）昏庸如此，殊堪大噱；而猶不自揆，妄欲立功。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見通鑑），浩敗而內外大權，一歸於溫。遂懷異志，窺覬非望（見溫傳），皆由簡文任用非人之所致也。然則浩之起，但能速晉之亡耳。江左蒼生，其如浩何？唐史臣之論浩曰：「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士，談論非奇正之要。」諒哉！晉人之賞譽，多不足據；如殷浩者，可以鑒矣！[40]

家國之興亡攸關眾生福祉，向來為余氏所高度關切，因此見殷浩在朝野

---

[39] 他如〈德行〉第六則、〈文學〉第十二則、第一百零一則、〈賞譽〉第八十八則、〈品藻〉第四則、〈自新〉第1則……亦可見「有識」與「無識」之評。

[40]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賞譽・99・箋疏1》，頁476。

一片賞譽聲中現身於歷史戰場，卻未能拯救蒼生於水火，反而「速晉之亡」，余氏乃集後來之史料對殷浩的批判，與當時名士溢美之語相互對照，最後轉「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一語而成「江左蒼生，其如浩何？」的慨嘆！所謂「晉人之賞譽，多不足據；如殷浩者，可以鑒矣」，殷浩遂成余氏質疑晉人賞譽之不當的最佳釋例，雖未可以成敗論英雄，然不可倚賴名士之風流來安邦治國，卻是不爭的事實，余氏認為賞譽不當足以誤國，足以辜負天下蒼生，故面對名士相互揄揚、彼此溢美的賞譽，又豈能不悲歎扼腕？

在品論人物「心跡可否一致」的問題上，見仁見智自所難免，不過卻是以史德為重之史評家不容輕忽的探索進路，因為著眼於此，每能穿透歷史的表相，一窺對象幽隱潛在的意識，從而展現出史評家犀利的識見，如〈德行〉二十七載「胡威之清」一則劉注引《晉陽秋》言及父子清慎如此一事，余氏對此即提出質疑：

> 嘉錫又案：都督此舉，誠有意為詒，然雖相助經營，又進少飯，威已謝之以絹，無損於父子之清白。威誠不能隱而不白以欺其父。為質者聞之，喚都督來，呵斥其非，使知愧悔足矣。此輩小人，何足深責！竟與除名，已嫌稍過；而又杖之一百，豈非欲眾口喧傳，使人知其清乎？好名之徒，傷於矯激，乃曰「清畏人知」，吾不信也。[41]

余氏從有失情理的表現認為胡質之清傷於矯激，因此視之為好名之徒，不信其所謂「清畏人知」的稱譽，此質疑未必無理，然若依此視角，「清畏人知之跡」即從「欲使人知之心」而來，如是其「清」名不僅名實不符，而且以假亂真，造成是非善惡的混淆。再如袁宏於《晉書》本傳載其「宏性強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余氏卻從〈文學〉九十七則「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及劉孝標

[41]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27・箋疏3》，頁29。

注引《續晉陽秋》載「袁宏為東征賦不及桓宣城」的兩種線索，對袁宏的作法進行一種批判性的推論：

> 孝標之意，蓋疑不道陶公與不及桓彝為即一事，而傳聞異辭。今晉書文苑傳則兩事並載。嘉錫以為二者宜皆有之。陶侃為庾亮所忌，於其身後奏廢其子夏，又殺其子稱，由是陶氏不顯於晉。當宏作賦時，陶氏式微已甚。其孫雖嗣爵，而名宦不達。陶範雖存，復不為名氏所與。觀方正篇載王脩齡卻陶胡奴送米，厭惡之情可見。非必胡奴之為人果得罪於清議也，直以其家，出自寒門，擯之不以為氣類，以示流品之嚴而已。宏之不道桓公，亦猶是耳。至於桓，固是老兵，然生殺在手，宏安敢違忤取禍？其初所以宣言不及桓宣武城者，蓋腹稿已成，欲激溫發問，因而獻諛以感動之耳。[42]

余氏認為劉孝標疑「不道陶公」與「不及桓彝」為即一事，但他認為今《晉書・文苑傳》兩事並載，可見二者皆有之，由是從陶公之式微，桓溫之強橫，兩相比對，以揣測袁宏的心態，而有對桓溫獻諛的推論，對袁宏的評斷或容有爭議，[43]余氏亦未能對於避禍者予以同情的體貼，然若依《續晉陽秋》所載「時桓溫在南州，宏語眾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啟溫，溫甚忿」的文獻以觀，余氏的揣測亦不無道理，因為相對於文學九十七則「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所載，《續晉陽秋》的「宏語眾」、「滔與宏善」、「笑而不答」、「滔密以啟溫」，這些線索都極易使人認為袁宏在此政治現場上已萌心機，欲藉由作偽以使桓溫感動，而質疑袁宏的言行表現中可否存有獻諛的可能，在此判讀下，袁宏遂成表面強正亮

---

[42]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文學・97・箋疏3》，頁275。

[43] 張蓓蓓認為余氏對袁宏似無深刻認識，僅以普通文學侍從視之，不若錢穆與雷家驥能從正面的觀點論述袁宏的表現。見氏著《魏晉學術人物新研・袁宏新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頁162-164。

直，骨子裡卻仍心存逢迎者，自是余氏無法認同的角色。

面對這種褒貶失實的現象，余氏每透過不同之政治立場與變化之世局情勢的線索，讓我們了解到其背後複雜的形成因由，如〈識鑒〉第三載「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一則，劉孝標注引《傅子》以證文本三賢皆敗德之人的說法，余氏箋疏遂引李慈銘之見予以反駁，認為此識鑒之論，《魏志嘏傳》皆不可信，而傅玄所撰《傅子》乃「仇怨之辭」，《世說》則轉據舊聞，是非多謬，所謂「國史既以忠為逆，私家復誣賢為奸」，[44]余氏承此說法，再從《魏志・荀彧傳》注引何劭〈荀粲傳〉的資料來說明荀粲、傅嘏、夏侯玄三者的關係，

主張傅嘏與荀粲意氣相合，傅玄與傅嘏之親緣關係，遂成此欺天下後世的矯誣之言，混淆是非，蒙蔽了歷史的真相，然「後世論史者」，卻「皆深信而不疑，無一人能發其覆者」可謂沉痛！[45]若依余氏的觀察與判斷，此識鑒事例的歷史背景，攸關曹氏與司馬氏之政治立場及權力消長，因此如不能進入此現實場域，則無法了解這些評價背後的因由，而余氏肯認夏侯玄，乃在魏之忠臣，方正不阿；批判傅嘏，乃在司馬氏之死黨，叛君負國，又善揣時勢，與世周旋，可見對此褒貶不實的指控關涉到魏晉之際的政治立場，已涉及易代之際士人的出處問題，有必要留待下一節以論之。

四、現象之三：不明出處、不見忠義

周祖謨於〈余嘉錫先生傳略〉提及：余嘉錫於任輔大教職之際，正值日據北京的國難之時，在當時以道德至上的輔大教師們，為了維繫民

---

[44] 詳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識鑒・3・箋疏1》，頁385，李慈銘語。

[45] 詳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識鑒・3・箋疏1》，頁385-386，余嘉錫案語。

族氣節，與日據之偽校無形中涇渭分明，互不往來，因此對於出任偽校偽職者，亦多表不恥；[46]而擔任輔大國文系主任的余嘉錫，向來即深受傳統儒家正統思想的薰染，又面臨偽政府當道、不少名學者接受偽校聘任之際，是以如何能續承此民族氣節、堅持正義，以表達對祖國的效忠，遂成為余氏著書立說背後的核心關懷所在。在此脈絡下，余嘉錫箋疏歷經多朝的《世說新語》，自不免投射出揚忠棄叛的春秋精神，成為余氏箋疏《世說新語》不容忽視的重要向度，在此即依漢魏與魏晉兩個易代之際的文獻，對余氏的相關論述現象進行具體的考察與詮釋。

〈德行篇〉第六則載「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箸剟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一事，余氏除了透過考證的方式，質疑此記載無「荀悅」而有「荀彧」之不當，[47]讓我們了解到這個傳為美談的佳話其實是附會、誣矯的產物之外，對於荀氏後人的批判尤不遺餘力：

> 嘉錫案：父子同游，人間常事，何至上動天文？此蓋好事者為之，本無可信之理。據漢雜事所載，殆時人欽重太丘名德，造作此言，

---

[46] 見周祖謨，〈余嘉錫先生傳略〉，《余嘉錫文史論集》，頁665-666。

[47] 「觀諸書所述，八龍之中，慈明名最著，叔慈次之，餘六龍碌碌無所短長。足見純盜虛聲，原非實錄。據群輔錄，後漢時尚有汝南周燕五子，及北海公沙穆五子，並號五龍，乃不為人所知。而荀氏八龍，獨為人所稱述。蓋以慈明位至三公，文若及其子孫又顯於魏、晉故也。考悅、彧同為曹操所辟，而悅忠於獻帝，與彧終為曹氏佐命者不同。所著漢紀、申鑒，皆卓然足以自傳，不愧為荀氏之才子。文若小於仲豫十三歲，而此節言德星之聚，有文若而無仲豫，其故可知矣。」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6・箋疏3》，頁9；余氏亦引程炎震云：「案范書荀淑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荀彧以建安十七年卒，年五十，則當生于延熹六年。距荀淑之卒已十四年矣。若非范史紀年有誤，則其事必虛。考袁山松後漢書亦載此事，而云荀數詣陳，蓋荀陳州裏故舊，過從時有，而必以文若實之，則反形其矯誣矣。」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6・箋疏4》，頁10。

與荀氏無與焉。乃其後人自為家傳，附會此事，以為家門光寵，斯其誣罔虛謬，足令識者齒冷矣。[48]

潁川荀氏，是漢魏之際的名族，余氏推論此事之由來當是荀氏後人為光耀家門使然，而「足令識者齒冷」的背後所對治的正是荀氏後人向曹氏靠攏的不齒作風，余氏遂藉題發揮，接著援引朱子《晦菴文集》之議論，認為黨錮殺戮之後，對士節的摧折，使剛方直大之氣，逐漸萎靡，而荀氏後人全身就事之計，卻被視為可以活國救民的深謀奇計，朱子視之為邪說橫流，並批判荀氏後人「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的作為，[49]荀彧是曹魏的開國功臣？還是為劉氏盡節？魏晉以來就無定論，故其功過得失歷來亦多所爭議，[50]余氏則認同朱子對荀氏後人的批判，當是春秋正統論及忠君觀念使然，此一既定立場左右著余氏的價值判斷，成為其一以貫之的理念訴求。

〈德行〉第十二則載「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嘗集子姪至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一事，余氏亦引李慈銘語表達他對易代變節之華歆的不屑，若依《世說》原載文意，王朗不如華歆是極為明顯的，然李慈

48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6・箋疏1》，頁8。

49 余氏引朱子《晦菴文集》三十五〈答劉子澄書〉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畝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蓋剛方直大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之一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之哉！」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6・箋疏1》，頁8。

50 逯耀東對於歷來史評爭議荀彧之問題，討論頗為詳切，可參〈司馬光《通鑑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一文，收入氏著《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頁477-488。

銘卻反用此則張華所謂「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一語來諷刺晉人之清談，認為兩者之優劣適得其反，關鍵之因即在易代之際面對新舊王朝的態度上，兩者存在著「兵至即迎」與「猶知拒戰」的不同。[51]同篇第十三則載「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一事，無庸置疑《世說新語》之原意在稱美華歆的識見與作為，余氏卻引章炳麟《訄漢昌言》指出華歆於漢魏廢興之際，背漢向魏，卻依然能享有時譽，遂發出「華歆之矯偽干譽，有非恆人所能測者矣」的批判，不僅使人不平於時人褒貶之不當，更表現出章氏透視華歆政治人格後的厭惡之情，[52]余氏於案語後又補上「特作惡不如歆之甚耳」的評斷，對華歆之不屑可想。〈方正〉第三則載「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慽容。帝答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群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一事，余氏箋此乃承李慈銘[53]與洪邁[54]的史評之見而發：

---

[51] 李慈銘云：「案華守豫章，兵至即迎；王守會稽，猶知拒戰。華黨曹氏，發璧牽后；王被操徵，積年乃至。此蓋所謂『學之形骸之外，去之更遠』者也。二人優劣，不問可知。晉人清談如此。」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12・箋疏2》，頁14。

[52] 漢、魏廢興之際，陳群所為，未若華歆之甚也。及魏受禪，群與歆皆有慽容，時人議群者猶曰：「公慙卿，卿慙長」，獨于歆，魏、晉間皆頌美不容口。曹植亦不慊於其兄之奪漢者，然所作輔臣論，稱歆「清素寡欲，聰敏特達，志存太虛；安心玄妙。處平則以和養德；遭變則以義斷事。」然則歆之矯偽干譽，有非恆人所能測者矣。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13・箋疏2》，頁14-15。

[53] 李慈銘云：「案陳群自比孔父，義形於色。可謂不識羞恥，顏孔厚矣！疑群爾時尚未能為此語。與其子泰對司馬昭『但見其上』之言，皆出其子弟門生妄相附會。如華嶠《譜敘》稱其祖『歆以形色忤時』，狗面人言，何足取信！」

[54] 《容齋隨筆》卷十曰：「夫曹氏篡漢，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

> 嘉錫案：華歆為曹操勒兵入宮收伏后，壞戶發壁牽后出，躬行弒逆。是亦魏之賈充，何至「以形色忤時」！歆、群累表勸進，安得復有戚容？蓴客以為出於其子孫所附會，當矣。容齋以二人為一世之賢，猶未免流俗之見也。[55]

余氏必有同於李慈銘「不識羞恥，顏孔厚矣」、「狗面人言，何足取信」的說法及洪邁「曹氏篡漢，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與「士風不競，悲夫！」的感歎，在歷來史評的匯集下，對陳群、華歆的作為遂得以釋放出更大的批判力道，余氏除接受李慈銘以形色忤時乃其子孫附會的推測之外，猶認為洪邁以「一世之賢」指稱「華歆、陳群」仍是一種「流俗之見」，可見對於這些身處易代之際的名臣，周旋於新舊勢力之間而見風轉舵以謀得最大私利者，余氏其實是不留任何情面的，即使如南陽宗承者流，曾以「松柏之志猶存」之語忤旨而見疏於曹操，亦無法逃過余氏對易代之際所立下之嚴厲的道德判準：

> 嘉錫案：宗承少而薄操之為人，老乃食丕之祿，不願為漢司空之友，顧甘為魏皇帝之臣。魏、晉人所謂方正者，大抵如此。東漢節義之風，其存焉者蓋寡矣。[56]

余氏的感歎皆是從一人的責難帶到整體士風的批判，因為這是整個時代風氣使然，特別在「東漢節義」的對照下，更顯魏晉士風之不競。余氏不惟對漢魏之際的名士責之以「忠」，對於魏晉之際的名士依然是秉持當忠於舊朝的判準，〈德行〉第十九則載王戎言王祥「居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一事，余氏先援引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道出「清談之禍，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猶未已

討，忍復仕其朝為公卿乎？歆、群為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蓋自黨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

[55]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方正・3・箋疏1》，頁281-282。

[56]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方正・2・箋疏2》，頁280。

也」的感歎，即同感於魏晉清談之誤國而造成亡國的遺憾，並檢討胡氏以為王祥「不拜晉王」之可尚，[57]而直透其老於世故、以退為進的謀略機心，可謂比胡三省訴諸更為嚴厲的標準，他認為魏晉之際的權臣，皆可謂馮道之流，有待良史來揭發他們無恥的面目。[58]

〈德行〉第四十二「王綏試守孝子」一則，余氏視桓玄所寵用之王綏為「賊黨」之流，然時人竟以「試守孝子」稱美之，對此余氏不免心生感慨：

> 蓋魏晉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國。故奉親思孝，或有其人；殺身成仁，徒聞其語。王祥、何曾之流，皆不免黨篡。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竟成虛言。六代相沿，如出一轍，而國家亦幾胥而為夷。爰及唐、宋，正學復明，忠義之士，史不絕書。故得常治久安，而吾中國亦遂能滅而復興，亡而復存。覽歷代之興亡，察其風俗之變遷，可以深長思矣。[59]

---

[57] 《通鑑》七十九胡注曰：「正始所謂能言者，何平叔數人也。魏轉而為晉，何益於世哉？王祥所以可尚者，孝於後母，與不拜晉王耳。君子猶謂其任人柱石，而傾人棟樑也。理致清遠，言乎？德乎？清談之禍，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猶未已也。」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19・箋疏1》，頁22。

[58] 嘉錫案：胡氏之論王祥是矣，若其以祥之不拜司馬昭為可尚，則猶未免徇世俗之論而未察也。考其時祥與何曾、荀顗並為三公，曾顗皆司馬氏之私黨，而祥特以虛名徇資格得之。祥若同拜，將徒為昭所輕；長揖不屈，則汲黯所謂「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之意也。故昭亦以祥為見待不薄，不怒而反喜。此正可見祥之為人，老於世故，亦何足貴！五代之時，郭威反，隱帝被弒，威縱兵大掠。然見宰相馮道，猶為之拜。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若道之所為，豈不更難於祥？然後人不以此稱道而笑罵之，至今未已。則以歐陽修作傳極詆道之無恥也。魏晉之際，如王祥等輩，皆馮道之流，其不為人所笑罵者，亦幸而不遇歐陽氏為作佳傳耳。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19・箋疏1》，頁22。

[59]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39・箋疏3》，頁46-47。

君父忠孝先後之辨為魏晉清談論辯的議題之一，[60]魏晉南朝在忠君與孝道之消長變化與互動關係方面亦為學界所樂道，[61]余氏則從王綏之孝親卻不知忠君的作為，指出魏晉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國」的問題，「孝親」可是儒家文化維繫社會倫常的大紐，「忠義」則在此大紐之上進一步的延伸，但若人人僅顧及個人家族之利益，而未能充擴至忠君愛國，則其國必岌岌可危，最後只好走入為夷所滅的悲劇，這正是不見忠義、儒學衰疲的魏晉時代所必須承擔的歷史命運，必待唐宋正學復明後，[62]忠義之士頻出，才能真行常治久安之道。

余氏對於竹林七賢之嵇康、阮籍、山濤的評價，亦以其可否忠於舊朝為重要判準，〈品藻〉第七十一則談及「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劉注引孫盛《魏氏春秋》「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糾之，余氏頗不以為然地指出：「乃心魏室」的嵇康為七子最優，阮籍志求苟免，[63]山濤與時俯仰，自難以菲薄權奸之嵇康相抗衡。[64]〈賢媛〉十一則載山妻以「識度」賞山公，山公曰：「伊輩亦

---

60 見唐翼明《魏晉清談》第三章〈清談內容考察〉之（5）「君父先後之辨」的相關論述（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頁143-147。

61 唐長孺〈魏晉南朝的君父先後論〉一文考察漢代到魏晉南朝期間儒家忠君和孝道觀念之間的互動，提出魏晉以降孝道佔據上風的說法，收入《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36。王心揚則認為在晉室南渡之後，忠君觀念亦有強化的趨勢，見氏著，〈家與國的抉擇——東晉士人對忠君觀念的提倡〉，載於《臺大歷史學報》第39期（2007.6），頁107-137。

62 余氏對東晉南北朝儒學之衰，頗多感慨，所謂「東晉士大夫不慕老、莊，則信五斗米道，雖逸少、子敬猶不免，此儒學之衰，可為太息！」、「蓋南北朝人，風氣如此。韓昌黎所謂不入於老，則入於佛也。」分明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39・箋疏1》，頁41、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言語・97・箋疏1》，頁149。

63 余嘉錫對阮籍處魏晉之際的作為亦頗多批判，詳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任誕・2・箋疏3》，另《余嘉錫文史論集・讀已見書齋隨筆・阮籍詠懷詩》之相關論述亦可參看，頁620。

64 嘉錫案：「竹林諸人，在當時齊名並品，自無高下。若知人論世，考厥生平，

常以我度為勝」，余氏亦由此發出不平之鳴，其議論魏晉竹林名士的關鍵人物「嵇康—阮籍—山濤」三人高下，忠魏與否是一重要判準，在此脈絡下，對於柔媚處世的山濤，直以「搖尾於奸雄的功狗」稱之，可謂極盡鄙夷之能事，並由此發出士人於亂世當有進退不失其正的堅持，山濤遂成為所有士人當引以為戒的對象，[65]余氏又進一步透過史料的線索，從山濤的具體言行中，一窺其善於揣摩時勢、與時俯仰的心機，[66]余氏極欣賞不畏強權、正直剛毅之人，然對於心中無所堅持卻善於隨勢周旋以迎合權貴者，則每訴諸嚴厲的批判，山濤不僅在其政治人格上倍受余氏輕蔑，〈政事〉第八則載嵇康被誅後，山濤舉康子紹為祕書丞，紹咨公出處，山濤言：「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余氏對此尤苛責再三：

> 嘉錫案：紹自為山濤所薦，後遂死於蕩陰之難。夫食焉不避其難。既食其祿，自不得臨難苟免。紹之死無可議，其失在不當出仕耳。……由斯以談，紹固不免於罪矣。勸之出者豈非陷人於不義乎！所謂「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尤辯而無理。大抵清談諸人，

則其優劣，亦有可言。叔夜人中臥龍，如孤松之獨立。乃心魏室，菲薄權奸，卒以伉直不容，死非其罪。際正始風流之會，有東京節義之遺。雖保身之術疏，而高世之行著。七子之中，其最優乎！嗣宗陽狂玩世，志求苟免，知括囊之無咎，故縱酒以自全。然不免草勸進之文詞，為馬昭之狎客，智雖足多，行固無取。宜其慕浮誕者，奉為宗主；而重名教者，謂之罪人矣。巨源之典選舉，有當官之譽。而其在霸府，實入幕之賓。雖號名臣，卻為叛黨。平生善與時俯仰，以取富貴。迹其終始，功名之士耳。」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品藻・71・箋疏1》，頁537。

65 嘉錫案：「濤一見司馬師，便以呂望比之，尤見賞於昭，委以腹心之任，搖尾於姦雄之前，為之功狗。是固能以柔媚處世者，宜其自以為度量勝嵇、阮，必當作三公也。嗚呼！觀於竹林諸人之事，則人之生當亂世而欲身名俱泰，豈不難哉！然士苟能不以富貴為心，則固有辟人辟世，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雖不為山濤，豈無自全之道也歟？」詳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11・箋疏2》，嘉錫案語，頁680-681。

66 詳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11・箋疏2》，頁681。

多不明出處之義。[67]

余氏則以為「紹之死無可議」，然其失卻在「不當出仕」，由是勸之出者豈非陷人於不義，更將矛頭指向山濤，余氏繼而引顧炎武《日知錄》以為之戒，顧氏以為山濤「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當時傳頌以為名言，其實正是敗義傷教，率天下而無父也，乃邪說之魁，孟子所謂楊、墨之言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68]余氏不僅肯定顧氏之言痛切，尤為救時之良藥，更進一步從山濤此言的學術發展背景發論，認為山濤附會《周易》，正是魏晉人老易之學的表現，即是飾六藝以文姦言、率天下而禍仁義也，[69]而此正如向、郭之調停堯與許、山林與當塗，形成有違於莊周之旨的新莊學，它絕非僅是其遜避免禍之心態下的產物，乃是名士為了自全以求富貴，故衍生出處同歸、仕隱無異的論述，以作為他們不明出處的自我開脫之辭：

> 嘉錫案：莊生曳尾塗中，終身不仕，故稱許由，而毀堯、舜。郭象注莊，號為特會莊生之旨。乃於開卷便調停堯、許之間，不以山林獨往者為然，與漆園宗旨大相乖謬，殊為可異。……要之魏、晉士大夫雖遺棄世事，高唱無為，而又貪戀祿位，不能決然舍去。遂至進退失據，無以自處。良以時重世族，身仕亂朝，欲當官而行，則生命可憂；欲高蹈遠引，則門戶靡託。於是務為自全之策。居其位而不事其事，以為合於老、莊清靜玄虛之道。我無為而無不為，不治即所以為治也。魏志王昶傳載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且以書戒之，略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

[67]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政事・8・箋疏2》，頁171-172。

[68] 詳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政事・8・箋疏2》，余氏引顧炎武日知錄十三語，頁172。

[69] 詳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政事・8・箋疏2》，余氏引易豐卦彖及其案語，頁173。

> 虛為名。欲使汝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綿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昶之言如此，可以見魏、晉士大夫之心理矣。向子期之舉郡計入洛，雖或怵於嵇中散之被誅，而其以巢、許為不足慕，則正與所注逍遙游之意同。阮籍、王衍之徒所見大抵如此，不獨子期一人藉以遜詞免禍而已。[70]

余氏認為魏晉之徒取義於莊子，卻在山林與當塗之間進退失據，無以自處，頗能闡述魏、晉士大夫雖遺棄世事，高唱無為，而又貪戀祿位，不能決然捨去的矛盾心理。這種柔媚處世務為自全的作法，終使儒家「忠義」的價值衰微不振，而儒道的出處之義亦在晉人會通兩端的玄智及權用下，失去了各自安頓其義理歸屬的定位。依此看來，余氏對易朝做官者多有疾辭，以為不忠，尤其是魏晉名士內有利己之私，外搏浮世之名，處大官之貴，敗天下之大德，卻為世所重，難怪為余氏所不平不齒，他力持忠君愛國與盡責執事的態度，自無法接受魏晉名士周旋於政權之兩端，以求自全之道甚至謀取更大利益的作為，或身在魏闕而心尚玄遠即在官無官官之心的表現。可見余氏是以儒家傳統作為其檢視魏晉人物與魏晉思想的價值判準，雖能見魏晉士人之病症，卻難賞魏晉士人之殊妙，畢竟魏晉士人在出處進退上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與生命型態，已非先秦儒家與道家所能籠罩涵括，但在余氏不明出處、不見忠義的訴求下，亦進一步突顯了忠義的人格價值及出處的淑世意義。

余氏以忠臣不事二君的觀念作為其批判易代之際的諸多名臣，諸如漢魏之際的荀彧、華歆、陳群、王祥、宗承……等，魏晉之際的阮籍、山濤……等，都在這種判準下受到嚴厲的指責，余氏並連結傳統史評，以強化這種文化傳承的忠義價值，因此對於身處易代之際的名士，能不

---

[70]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言語・18・箋疏1》，頁79-80。

為所屈者，即給予極高的評價，若有所變節者，亦每訴諸強烈的批判，此一立場流竄在全書很多角落，使原本理應不相關的篇目，都因此沾染著余氏強調出處之義與忠義之價值的論述，在在顯示余氏置身於異族佔領之下的時代危機與文化焦慮，並且進一步從名士不明出處的言行檢討到魏晉玄同出處、齊一仕隱的思想，連結行為與思想的關係以作為魏晉文化的總體反省，都使我們無法忽視此一詮釋向度在余氏箋疏《世說新語》中的特殊性與必要性。

五、結語

經由以上三個面向的考察，我們對於余嘉錫以史評進路箋疏《世說新語》的詮釋現象，當能有一更為具體的掌握。目錄學專家的身分使余氏箋疏《世說新語》能立基於傳統的客觀史料，並致力於辨偽、補正、校勘的考證工作，以達歷史真實的要求，他又博覽群書，故得以援引多重文獻，強化其史評的史料依據，並從中折衷、斟酌、商榷，以辨真偽、明是非，在箋疏《世說新語》的史學傳統上，遂能蔚為大家，扮演起經典傳播的重要角色。

不過余氏最不容忽視的詮釋向度當在其植根於傳統文化與家國興亡的歷史關懷，強調知人論世，標舉道德價值，故其《世說新語箋疏》遂匯集諄諄之言，寄情騁懷以針砭魏晉士風，提點世道人心，將史傳論贊之以史為戒的儒家傳統發揮得淋漓盡致，由是他批判魏晉風習之澆薄、賞譽之不當，並不時提點國土淪喪之遺憾，尤其身處日寇侵華的民族存亡之際，更強化其表彰民族氣節、激揚愛國情操的使命，余氏歎賞耿直、剛正、忠義之流，但對於賣國求榮、依阿苟容者，亦不時流露出深惡痛詆之情，而帶有強烈之個人好惡的色彩，可以說在余氏一以貫之的苦心經營下，《世說新語箋疏》已成為近代傳統知識份子身處危急存亡之秋的暮鼓晨鐘，不時在感時憂國的悲鳴中揚起民族自信心與文化認

同感的節奏，置身於軟調性文化當道的今日，反而展現出另一種剛直不屈、義無反顧的生命力道，使人不能忽略儒家傳統與歷史精神仍具有亙古不滅的價值，所謂「當將欲渡江之時，以北人初履南土，家國之憂，身世之感，千頭萬緒，紛至沓來，故曰不覺百端交集，非復尋常逝水之歎而已」、[71]「今觀帝之於賈充，不惜以王言綸綍，屢與人牀第之事，豈但非經國遠圖而已乎？開國之規模如此，有以知晉祚之不長矣」，[72]余氏不僅使儒家的道德規範意識進駐《世說新語》裡，更隨著《世說新語》每一片段的牽引觸發，在反覆輾轉中不斷召喚五胡亂華、永嘉之事的苦難記憶，以對治人的遺忘，莫負歷史對我們的聲聲吶喊。

然余氏以忠孝方正為矩矱、以儒家傳統為依歸的詮釋向度終究是與魏晉「崇尚美智」的文化精神與主流價值可謂判然有別，這種南轅北轍的現象使兩端之間所形成的「詮釋問題」更值得再三探索。惟受限於篇幅，本文在此僅基於「同情之理解」來具體呈顯其詮釋面向及現象，指出其間之異同得失都只是點到為止而已，後續將再依據此論述基礎，進行進一步的反省與批判。

本文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輔助，係作者【余嘉錫的「《世說》學」研究——以史評類為考察中心】（96-2411-H-259-009）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謹此致謝。

[71] 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言語・32・箋疏2》，頁95。余氏透過衛玠南渡所言之語的引發，寄託家國之憂的共感。

[72] 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13・箋疏5》，頁685。余氏經由武帝與賈充於開國之際不論經國遠圖，竟屢言賈充與前婦李氏及郭氏之私事，以歎晉祚之不長。

On Jiaxi Yu's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on *Shishou Xinyu*

Kuan-Hung Wu*

Abstract

Jiaxi Yu was well versed in historical studies and completed Commentaries on *Shishou Xinyu*. His study was characterized by a rigorous and objective approach. Meanwhile, it was also affected by traditional Sueng intellectualism, which emphasized a distinction between altruism and self-centeredness and stresseed the significance of virtues. In his concern about his country out of patriotism, his work projects his subjectivity and his care for the epoch. Nevertheless, there is no specialized study on Yu's historical approach adopted in his commentaries on *Shishou Xinyu*.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ddress three particular aspects: diminishing social customs and inappropriate consequences, mismanaged awards and false evaluation, and unknown sources and misplaced integrity. In so doing, this paper aims at synthesizing and categorize Yu's scattered, fragmentary and abundant commentaries. Through a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commentaries, this study will show how the three aspects unfold and are exemplified in his commentaries. Meanwhile, it will bring to light Yu's moral stance and nationalism. It is hoped that this article will lay a foundation on which further studies on *Commentaries on Shishou Xinyu can be based.*

Keywords: Jiaxi Yu,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Shishou Xinyu*, Wei-Jin intellectualism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Hwa University